

书话文存

王学泰·著




商務印書館

书话文存

坎坷半生唯嗜书

王学泰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坎坷半生唯嗜书/王学泰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书话文存)

ISBN 978 - 7 - 100 - 07436 - 0

I. ①坎… II. ①王…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8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Kǎnkěbànshēngwéishìshū

坎坷半生唯嗜书

王学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436 - 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¼ 插页 1

定价: 34.00 元

总 序

王春瑜

我国历史悠久,并且首先发明了印刷术,历代所印之书,总数虽不可确考,但以一人之力,终其一生,所读之书也不过是存世之书的九牛一毛而已。然而让人纳闷的是,历代读书人写读书心得的书却很多,甚至从东汉起,专门有了“书后”的文体,韩愈、柳宗元文集中屡见之,后人仿效者不少,明代名士王世贞更著有《读书后》八卷(按:前贤郭沫若、钱穆引《读书后》,均在“读书”下加逗号,将“后”字与下文联属,不知《读书后》乃书名,此一时疏于查考所致也)。不过,这类书与诗话类体裁有别,更与近代的书话有很大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书话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其中最为读者熟悉的是郑振铎的《西谛书跋》、阿英的《阿英书话》、唐弢的《晦庵书话》。前年是郑振铎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中华书局重新编选郑先生的书话文字,印成《漫步书林》,堪称郑振铎书话精华。199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姜德明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除《阿英书话》外,另有《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郑振铎书话》、《巴金书话》、《唐弢书话》、《孙犁书话》、《黄裳书话》。就我而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研究生时,鲁迅、阿英、郑振铎、唐弢的书话,深深启迪了我。鲁迅的名文《买〈小学大全〉记》,使我感受到了清代文字狱的血腥,此文我反复读过好几遍。郑振铎的《西谛书跋》,丰富了我的目录学知识。阿英的《小说闲谈》对研究明代文化,特别是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61年,唐弢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连载《书话》,虽属千字文,但文笔清新,我每篇都必看,增加了现代文学史的知识。后来结集出版,

我买了一本，爱不释手。所谓书话，无非是有关书及著者的种种话题。这类作品，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读者的欢迎，我想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书都是学者作家化或作家学者化的结晶。单就郑振铎、阿英、唐弢而论，郑先生是中国文学史的权威、藏书家，也是文学家；阿英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藏书家，也是文学家；唐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也是有“鲁迅风”之誉的杂文家。因此，他们写的书话，信手拈来，道人所未道，文字简洁，甚至文采斐然，读后不仅增加学养，还因文字娱目，而感到愉悦。这几本书无疑是传世之作，书话这种文体，也必将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正是本着传承书话文体的愿望，我主编了这套《书话文存》。诚然，先贤们的学问成就、文学业绩，我辈难以企及。但是，加盟本文存的作者，都既是学者，也是作家。王学泰不仅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也以研究游民及江湖文化驰名学界，并写了不少杂文、随笔；李乔是研究中国行业神的专家，有专著行世，并以大量的杂文、随笔活跃于文坛；伍立杨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史，有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有影响的专著，更以散文家为读者熟知；赵芳芳虽没有以上诸位的名气，但从她已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一花可可半梦依依》、《朱颜别趣》以及收入本文存的新作来看，她不仅饱读诗书，且文字温润似采采流水，她写的书话，别具风格，使人耳目一新。知识性、可读性是书话的命脉。就此而论，我敢说，本文存是与前辈们的书话一脉相承的。

编一套书话文存，余有志于此亦久矣。前年京中及陕西有出版社编辑来舍下约稿，我提出编此文存，他们都表示欢迎。但后来报选题，都被单位一把手否决。老实说，时下某些出版社的一把手，根本就是学术外行。去年我跟商务印书馆的王乃庄、常绍民、丁波先生说起出版这套文存，他们都很支持，此书才得以面世。这里，我对商务印书馆深表谢忱与敬意！

2010年2月20日

农历年初七，于老牛堂

目 录

自序	1
读书的苦与乐	
——读书随想录(一)	7
接触最早的书	10
知识的摇篮——图书馆	12
逛书店和买旧书	16
“文革”中的琉璃厂	18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24
书与读书者的浩劫	30
话说“内部书”与“内部书店”	
——读书随想录(二)	34
“内部书”在理论上的尴尬	34
没有一定之规的“内部书”	36
宽严不同的“内部书店”和与时流转的“内部书”	38
“文革”中期出版的几本怪书	42
怪书《柳文指要》	42
众说纷纭的《李白与杜甫》	51
这也叫做文学作品	55
重读《诗经》	
——评《诗经名物新证》	57
《诗经》与礼乐	57
二重证据法	64

探源溯流说《论语》	69
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69
《论语》地位的涨落	76
近百年的儒学与《论语》	80
《宋文鉴》的编刻与时政	86
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	103
破梦者如是说	
——评《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	107
《百年一遇》序	119
“家”给了我们什么?	120
“家”和《出身论》	123
“生民之乐”	128
《偷闲杂说》序	133
《笑林广记》序	136
《炼狱者雕像》序	142
《发现另一个中国》序	144
《中国饮食文化简史》自序	151
从徐致靖谈到《古城返照记》	156
县衙门的“官”与“吏”	165
“吏治”与“治吏”	
——评《中国古代吏治札记》	169
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169
吏治与治吏	170
古代官吏制度的启示	172
真游戏与潜规则	
——评吴思的《血酬定律》	174
笔力千钧,神流方寸	
——读宁伯龙先生《垂露悬珠集》	177

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匠学七说》	180
杂文家应该是社会批评家	
——读牧惠先生的《小报告以外》	183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186
《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	190
回首文坛往事的思考	
——评《往事何堪哀》	194
“原生态”的思想家	
——评《李宗吾新传》	198
“厚黑教主”旧相识：	198
“原生态”的思想家？	199
“厚黑”是个思想与话语的平台：	200
思想前沿的思考者	201
为什么“厚黑学”再度张扬？	202
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	204
（附）新文化运动与溥仪	206
话说《无知者无畏》	212
说王朔	212
关于知识分子	216
关于金庸	220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224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读《邵燕祥自述》	227
谦谦君子，人淡如菊	230
读方成	232
文中有画，画中有文	233
对幽默的探索	237
中国第一个出版家——陈起	240

出版人郭强 243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 246

后记 251

自序

“书”这个东西自产生后，对它就有两种态度，有好之者，也有恶之者，其原因都是源于它的重要。据说仓颉造字引起“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的“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对于单个的“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由无数的“字”组成的书了。当然，这些都是从文字书籍的功用角度来说的。对于像我这类读了多半辈子书，很少感到书的“功用”，只是对于我们这些受准老年痴呆症困扰的患者来说，还是对它心存感激的，因为在艰难的时刻书给我带来些慰藉，为我除烦驱闷，似乎是不离不弃的老友，不必与我划清界限。书不是人，读时也不必看它眉高眼低。我感到最能与我打成一片者也许就是书。这一点也许只有沉沦于社会底层的人才能理解。

有客曾问，什么是你最艰难时期？

我说，在没有书读的时候。

客很奇怪，你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难道没吃没喝不艰难吗？大学毕业时，你被整肃、被赶到农场监督劳动四五年，你不艰难吗？七十年代因发了点对“文革”、批林批孔的牢骚被抓至监狱囚禁三四年，你不艰难吗？为什么单以“没书读”为说，这是不是有些矫情、作秀？

我回答，不是。你可能条件优越，许多事情都会给你带来快乐，我则不然，一生当中许多快乐是书带来的。对我来说，读书是学习，后来是工作，更多的还是娱乐。所以读书对我就有特殊的意义，没有书读，只一天，就会没着没落；长了就会使大脑空白，难以忍受。半生当中，有时不让读书与你所说的那些倒霉的事儿重合，那更是痛苦不堪了。

第一，困难时期，身居北京，又在上大学，大学生的定量是 34 斤（比起四川人一二十斤定量高了很多），所在的学校又是大跃进的产物——北京工农师范学院（此校 1962 年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后，从未见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起）。这个学校前身是个干部学院，在大连附近有个农场，当时面临解散，困难时期，土地要退还给当地农民，但粮库中存着十几万斤粮食，校方借着我们下乡贯彻“十二条”（说具体点就是到农村去解散食堂，鼓动农民开荒，种“十边地”，以度荒年）的机会，把这十多万斤的粮食给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分了。那时的领导还比较公正，下乡的同学都得到较多的粮食补助，记得我好像分了 100 多斤粮票（分数次补给），另外在学校食堂吃饭也受到补贴。在北京粮食最困难的近两年时间，只有从那个时期经过的才会懂得 100 多斤粮食意味着什么。有了这个补助，困难时期我没浮肿过，还有精力在北京乱跑，不放过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和外国电影，跑旧书店，淘旧书、线装书……这时候虽然经济困难，但精神文化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前最繁荣的时期。而且那时许多老辈的著名艺术家大都还在，他们在首都舞台上留下了最精彩的时刻。我另有文记其盛。书籍出版也很繁荣，就是纸张黑些（没有漂白粉）、糙些（原料大多是稻草），但书出的种类很多，价格很低，一般大学生买得起。特别是学校不搞运动了，也没人批判“白专”了，躺在宿舍（当时校方提倡学生躺着，说是“保存热量”）安心看闲书也没有人管了。同宿舍的同学如果合得来，又没有专门爱打小报告的，那么一屋子八个人，躺在床上，海阔天空，七聊八扯，谈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聊楼乾贵、李光羲（李光羲演的苏联中亚地区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唱段“卖布歌”红遍京城），传告哪里地方剧种又到北京调演了，等等，名曰精神会餐。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前觉得最快活的时期。这个时期，我看书最杂，听戏、听音乐会、看电影、看话剧最多。

第二，1964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正常的农场，并非劳改场，但有少数“五类分子”在这里被监督劳动）“劳动考察”（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监督劳动。的确很痛苦，

但痛苦不在劳动,甚至不在监督,因为年轻时干活不惜力,监督不监督一个样,痛苦在于不让读书,更不让读专业书。借口是你们上完了大学,但你们在政治上不及格(不是实在的“政治课”,我的四门政治课都是“优”,而是虚无缥缈的“政治思想”),所以要在政治上补课,不许看业务书,也不许想业务。后来连马列的书、鲁迅的书也不许看了。理由是你们老用“马列”反毛泽东思想,所以马列的书不能读。1965年林彪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要贯彻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连看毛主席的书也受到批判。最可笑的是曹天予(就是前两年与周国平打官司那位)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也受到批判。曹说,我通读毛主席的书,通过潜移默化培养对毛主席的感情,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转过来。管理组批他说,你要什么潜移默化,应该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不要读那么多。于是说,不要读“四卷”,读“甲种本”(《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就可以了,“甲种本”只有二十多万字,相当“四卷”的八分之一。后来又说,其实“甲种本”都不用读,只要带着问题到《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就可以了。《毛主席语录》只有三四万字,后来又简化到只有三四千字的“老三篇”,简化到只有一百多字的“老三段”(《毛主席语录》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三段语录)。从这个趋势可见就是不让这些“反动学生”接触书。这对我这类“痴书者”“迷书者”真是最大的痛苦。其实反动学生有几十人,管理组只有两三人,当然不可能实施有效监督。但他们叫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提倡告密、打小报告,诱以各种虚幻利益。学生大多二十一二岁,没有任何经验,把这些视为正当。互相监督起了管理组不能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弥补了管理组人少的原因,还因为管理组成员虽然都是来自高校,但大多是行政人员,文化程度不高。例如一个学生看穆欣写的《稻奋》,被人发现,组内批判他,一位管理组的来了,只听参加会的这个讲“稻奋”,那个也讲“稻奋”,莫名其妙。但沉默是金,他缄默不语,大家莫测高深。最后他总结会议,用狠狠的口吻说:

“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他离开之后，有人差点儿笑背过气去。然而，学生之间的监督，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彼此心理都差不太多，大体了解，一揭发，立即中的；上纲上线，做诛心之论，这都是管理组人员做不到的。所谓“内行管内行”的可怕即在此。比如我箱底有一本李泽厚的《门外集》（这是李氏最早的一个集子，出版于五十年代末）。有天睡觉前翻了翻，被人发现拿走，后来批判时就拿其中李泽厚论诗引苏东坡《临江仙》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说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单调的劳动外，只能读报，读《人民日报》，其他的基本上都不能读，也没有书可读（当时也正在“文革”热潮中），几年下来，还不退化？那时如有机会我不放弃任何一些有字的纸张。记得北大经济系一同学，把他经济学讲义拆了做手纸，拿来上厕所。我分了半本。每天上厕所撕下一页（相当八开的一张纸），在厕所细读。我这半本是讲“边际效益”（在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不讲这些）的，连续两个月使我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第三，如果从对读书的限制程度来说，坐监狱都比在南口劳动好，因为监狱主要职责是看着犯人别出事，对于看书则管得不多。在看守所因为对送东西管制较严，所以对送书看得也很紧，但不至于连“毛选”“马列”一类的书都不让送，一般在号子里就有四本《毛选》，随便看，没人敢反对。1975—1976年，我在北京市局看守所K字楼待了一年多，读完了《马恩全集》1—20卷。其中觉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难读。字词都懂，连在一起就搞不清了。为了明白语意，我把重点段落句子加以分解，分清主谓宾，要在书上做标记，画各种符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看守所不许犯人有钢笔、铅笔一类锐利的杆状物。犯人也想出了一种替代物，就是把牙膏皮（那时都是铝皮或铅皮）展开作平面状，然后把牙膏皮用力卷成卷，一端磨尖，即可在纸上画出道道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两卷书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用它纪念我的这一次认真读书，虽然书上的“铅皮”痕迹大多已经模模糊糊了，平时我真很少如此认真地读过书，大多是囫圇吞

枣，不求甚解。

到了真正的监狱——北京一监，看书更方便了。因为所在的中队是“反革命中队”，过去的犯人也喜欢读书，有些犯人离监，就把书留了下来；狱中的“小报组”（编辑一种行之于“一监”的《劳改通讯》）也在这个中队，他们那里也有点书。这样“一监”的书源远较看守所丰富。另外，家里送书也远较看守所方便，很少被拒。据我所知，仿佛只有鲁迅的书不让送，其他的连线装书都能送进来。民国初年石印本《随园诗文集》我就是在“一监”读的，不知是谁送的。1976年社会上正在搞“评法批儒”，孔老二被骂成臭狗屎，“复辟狂”；秦始皇被捧上天，“千古一帝”。在送书时，只要说一句这是“法家著作”，比说是马列著作还管用。家里给我送的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杜预注的《春秋左氏传》，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都用这个借口拿进来了。其实，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不爱管犯人看什么书，只要不闹事就好。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里，因为“洋跃进”之故，监狱工厂是塑料厂，面临严重材料不足，犯人没活干，整天在监室读报。那时报纸就一张，翻来覆去地读，有两个小时足矣。其他干什么？弄不好就要闹事。如果犯人自己读读书，监室就安定、安全了许多。个别管理人员爱在读书上较真，目光老盯着犯人读什么书。常常催促犯人买刚刚出版的《毛选》五卷，指定要读报纸上的某篇文章等（后来《人民日报》老登冤狱平反的事，他才不催促犯人读报了），不让犯人看鲁迅的书等。有一次，这位管理人员还在会上给犯人做思想工作，讲为什么不让送鲁迅的书。他说，“有人家里送鲁迅的书，我让他们拿回去了，说这里不能看鲁迅的书。当时，我只这样做了，没有讲为什么，可能有人心里不服。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了罪，如果你们再读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所以你们不能读鲁迅。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就会口服心服了。”但监狱还是有鲁迅的书，是“文革”时出版的简装本。可能是这位干部主事之前，犯人的家属送来的。后来犯人走了，此书非珍本秘籍，也就留了下来。

在“一监”一年多的时间里，详读了范注《文心雕龙》，每节都做了笔记。此书后来被一个学生拿走了。用白话翻译《左传》（约三分之一），管理人员认为，“反革命中队”犯人犯的都是“右”的罪行，读读《左传》大有裨益。

犯人当中有些喜欢诗的，《汉语诗律学》被他们拿走了，久借不归，后来我平反了，王力先生那本书遂长留狱中。后来给学生讲“诗律”时，时时念及此书。

往事前尘，转瞬都成过去，现在退休了，谈及人生经历感触最深的还是有没有书读，真是一生所累唯有书。

读书的苦与乐

——读书随想录(一)

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读书，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读书有什么目的？我答不出，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应人写自己的读书经历时，又遇到这个问题。我想，这大约与自己开智识的时候家贫有关系吧！许多爱好的养成是需要钱的。例如喜欢音乐，最起码是要有钱买件乐器经常操练；好武也要有钱拜师学艺。唯有读书，找来一本书看就可以了。有钱，固然可以买；没钱，也可以借，而且，借来的书往往读得更认真。近一二十年“气功热”，气功师们的口头禅是“富学武，穷学文”，他们把气功是列在“武”的范围之内的，这样说的目的是找信徒们要钱（虽然，各种气功门派都把“德”作为练好气功的“首要条件”），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钱的人可以去读书。因为穷，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一卷书在手，可以反复读，躺着读，坐着读，甚至上厕所时读，都无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爱好，甚至成为了嗜好、癖好。读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烦恼和痛苦，因为什么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于乐的，因此，苏轼也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我来说，烦恼的来源大约有：

其一，因为读书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和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烦恼的根源。古代哲人有云“巧者劳而智者忧”，虽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许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讽刺那些遇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说“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块病”，也就是说多知多懂没有什么好处。大家嘲笑“忧天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

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种饥而食、困则眠不是许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吗？

其二，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年不让读书的历史（当然，担负着教化众生之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要“多读书，读好书”，那种对读书的限制和扫荡是通过对“好书”的定义和种种政策表现出来的），现在年轻人对这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这大约与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一样，困难时期，有些瘾君子甚至卷茶叶抽，问起他们，有人说没有烟抽的痛苦更甚于没饭吃（那时也是没有饭吃的时期）。对于我这个爱书人来说，没书与没饭的痛苦是相去无几的。困境中，实在没书看时，棋谱、教科书、文件汇编我都用以“遮目”过，好歹消磨一些时日。那个时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为看书而犯忌，经常会招来不虞之灾。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写这种文章的大约是个浪漫的人，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没有享受过“读禁书”带来的泪和血。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为私藏和阅读明朝野史，父子两人皆被处死；民国期间湖南某女学生因为读郭沫若的《落叶》而被枪毙；“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为传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历史真实总是与“诗”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就绝不会感到它富于诗意了。况且，“文革”之中，当时的“左派”不是向其管辖的平民百姓宣布禁止什么书籍，而是只开放些什么书，如毛著、马列、鲁迅，后来还有一些由三结合班子（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文字的三结合）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小说”（如《虹南战斗史》一类）。个人作品许可看的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等。其他一概在严禁之列，统统被送进了造纸厂。劫后侥幸留存下来的书籍好像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到处被通缉，不敢出来随便见人，除非是至爱亲朋才有可能互相串换一阅。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只是在“文革”初中期存在，林彪垮台以后略有好转。